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三十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山西的古代民族

董永刚
著

在漫漫数千年间,山西作为不同民族交往活动的舞台和不同民族交相荟萃的熔炉,始终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栋

复 审:张静华

终 审:严果生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30辑)

山西的古代民族

董永刚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数:300千字

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978-7-900454-17-1
G·132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领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璧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钟声扬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
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山西古代民族与民族关系	(4)
二、山西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概况	(8)
(一)先秦时期	(8)
(二)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	(17)
(三)隋唐五代时期	(28)
(四)宋元明清时期	(32)
三、山西是中国古代多民族文化的熔炉	(41)

引 子

山西地处我国南北要冲，其山川形势素以“表里山河”著称，故顾祖禹先生说：“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然而，“最为完固”的山川形势却遍布着或自然天成、或人工辟就的条条交通孔道以进出山西：东部太行山脉南北纵贯的“太行八陉”通往华北大平原；北部长城关隘自古就为北人南下和南人北上的通道要塞；中部纵贯桑干河、滹沱河、汾河河谷的一系列串珠状盆地，构成了南北交往的天然通道。同时，境内河流纵横，沿河谷可通四邻，进出山西。这便是山西“表里山河”的山川形势及其独具一格的自然人文生态。

晋文化便是这样的自然人文生态所孕育出的独树一帜的地域文化形态。由此我们说，在古老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山西大地和她所孕育的晋文化，便是汇聚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通道和纽带。这个“通道”和“纽带”的作用可远溯至旷古悠长的旧石器时代，并贯穿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全程。

新石器时代是走向文明的前夜，也是中国古代各民族形成的时代。据传在渭河流域古华山之下，有一支远古农业部落，对花情有独钟。以花为图腾和族徽。古“华”同“花”，因此“华”成为这支部落的族称。在与华隔河

相望的汾河流域，是一片宽阔肥沃的平原，并称这里为大夏，成为夏人，相传华人与夏人都属炎黄嫡裔，两地位置毗邻，语言文化特征趋同，于是逐步融合形成华夏族。可见最初的民族集团是分布于中原黄河流域的“华夏”和分布于华夏四围称为“四夷”的“西戎”、“东夷”、“北狄”、“南蛮”。“西戎”、“北狄”统称“戎狄”，即我国古代北方草原大漠的游牧民族；其余即黄河、长江诸流域的古代农耕民族。这便是构成中华多民族共同体的两大主体民族。他们创造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便是铸造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两大主源文化。晋南兴起陶寺文化便是中华两大主源文化汇聚融合的历史产物。

陶寺考古实物表明，在陶寺文化兴起的历程中，东方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南方的太湖良渚文化诸因素，统统汇聚到了山西的南部。所以，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陶寺文化譬喻为如同“车辐聚于车毂”一样的“综合体性质”文化。就是说，在距今五六千年至距今四千五百年间的文明起源历程中，铸造中华文明的两大主源文化：草原大漠的游牧文化和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统统汇聚晋南，兴起陶寺文化，山西大地便是汇聚中华两大主源文化的通道和纽带。

在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夏商周三代推进了早期文明的发展，至西周时期达到鼎盛，形成了高度完备的宗法奴隶制格局，由此制约和规定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趋势；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大转折时期；秦汉以来是中华文明充分发展、中华多民族共

同体组合形成时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尤其春秋战国至秦汉以来的文明演进历程中，山西大地及其孕育的晋文化充分地显示了汇聚中华两大主源文化和两大主体民族的“通道”和“纽带”作用。

苏秉琦先生在论述“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时写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而这里的“北方地区”就是苏先生提出的中国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之一的北方古文化区。山西北部属于北方古文化区南沿，南部属于中原古文化区的北边。

因此，从整体上看，山西南北是构成“北方、中原两大古文化区间的枢纽部分”，晋文化便是两大古文化区系的重要纽带。这是晋文化独具特色的个性。苏先生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是北方、中原两大文化区文化汇合点上相互撞击发生裂变形成的一颗新星”，是中华地域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文化形态。故而，自春秋战国至秦汉以来中华文明演进的历程，即是中华两大主源文化和两大主体民族进一步汇聚、融合的历程，也是晋文化最充分显示其“通道”和“纽带”作用的历程。

一、山西古代民族与民族关系

民族属于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民族不同于氏族、部落，不是完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人们共同体，而是兼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一个民族是由不同部落的人们混合形成的，民族的性质不同于种族，当然也不同于国家。

一个民族在形成以前，人们结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过着集体群居、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共产生活。其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口急剧增加，部落也相应增多，于是部落联盟也就相应而生。部落联盟的形成是民族诞生的基础，但由部落联盟发展为一个民族不仅需要漫长的历史时间，同时还需具备四方面的条件：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共同的心理特征与风俗习惯。

从部落联盟到民族的演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规律，但并非一个民族一经形成就亘古不变了，而是后期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在与其他民族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影响、逐渐融合。

伴随社会的发展，由于民族同化的原因，一个民族在不断接受另一个民族文化特征时，也就相应地会丧失本民族原有的特征。故而，一方面在有新的民族产生的同时，

又有许多旧的民族逐渐消亡或融于其他民族中。这种同化表现为强迫同化和自然同化两种方式。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不乏例举。如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南移的匈奴、鲜卑，宋时的契丹等族都为汉族所同化。可以说，强迫同化是民族压迫的表现，而自然同化则是文明进步的象征。这是涉及民族问题中最突出、最典型的问题。

民族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民族问题也随之变化，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中，问题的内容、性质与表现也就有所不同。以古代北方的山西地区为例，可以说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表现为掠夺与被掠夺、征服与被征服、同化与被同化的关系。尽管这一漫长的历史发展期间，各民族之间也有着频繁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但这些联系都是通过曲折的途径实现的，如汉代的“匈奴和亲”、北魏的“孝文改革”以及明代的“俺答封贡”等。

历史上，山西一直是北方各民族迭相活动的舞台，为此，北方各族之间、北方各族与中原民族间也就发生长期而频繁的交往。长期频繁的交往活动必然导致不同民族及其文化的交汇融合，进而逐步形成以华夏为主体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和辉煌的中华古文化。

先秦时期，北方民族的逐步南迁可以说自夏代就开始了，商代时有的已达到今山西北部，西周时进而深入到山西南部地区。如土方是我国唐虞夏商时期活动在北方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在《诗经》《楚辞》中都有土方与大禹

之间来往的记载。商代，商族与土方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殷墟甲骨中就有殷商与土方之间相互易物与战争的大量记载。

以畜牧业为主要经营方式的鬼方也是当时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一个民族集团，其上至商周，下迄春秋都与中原地区有过战争，在商周时期影响最大。据载，商武丁时期曾与鬼方有过三年战争。

晋国立国之初，周边四邻为戎狄民族所环，如东南部太行山麓的赤狄、北部的山戎及南部的伊洛之戎等。到春秋战国时期，晋与三晋国家（主要指赵国）与周边戎狄民族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在三晋大地上最富典型意义的事件莫过于晋国“华戎联姻”、“魏绛和戎”以及战国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这些都表现了中土文化对北方民族文化的吸收和摄取以及北方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渗透。

秦汉时，在山西活动的北方民族主要是匈奴与“三胡”，山西北部为其重要的活动场所。匈奴族统一北方草原后，与中原王朝对峙而立，其间虽有长城横亘，但并没有因此而阻隔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交流，“汉匈和亲”就是这一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

东汉时匈奴逐步衰败下来，到两晋十六国时，其余部又相继在北方建立汉、前赵、后赵、北凉诸政权，迭至隋唐始渐趋消失。东胡于汉初为匈奴所破后，分为乌桓与鲜卑二支。乌桓于三国时为曹操所灭。其后，鲜卑族徙居匈

奴故地，并逐步南徙，进而统一北方，建立强大的北魏王朝，把中国历史推向南北朝时期。其中，拓跋鲜卑政权定都平城达一个世纪之久。

伴随着所谓“五胡”的崛起，山西北部再度呈现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壮阔景观。北魏孝文帝“汉化改制”，是北方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融汇的光辉范例，表现了中原文化兼容并包的宽大胸襟和巨大凝聚力。

隋唐五代是政权迭相嬗变的历史，山西地区成为突厥族文化同汉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集中场所。突厥族系，原居我国西北新疆地区，后逐步东移，至隋唐发展到极盛，相继建立突厥汗国以及西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等政权，成为继匈奴、东胡之后最强大的北方族系，与隋唐政权相对峙。唐末五代时期，西突厥别支沙陀部乘乱崛起，先后建立后唐、后晋、后汉及北汉等国家政权。

契丹兴于唐，继五代时大盛，并建立辽政权，长期与北宋对峙。宋时，山西不仅为宋与辽、宋与女真等角逐抗争的主阵地，又是东胡系鲜卑族后裔契丹文化同中原文化交融的重要地区。“杨家将”的故事至今仍在广大地区流传。

元明时期，蒙古族成为北方地区的强大势力，在元明两朝一直是左右北方地区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土木之变”、“俺达封贡”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事件。

蒙古，原居于今内蒙古与东北三省间，后逐步向西迁往蒙古高原，南宋时崛起，建立蒙古汗国，进而灭西夏、金、及西域诸国。元亡后，遁居故地的蒙古族构成明王朝

严重边患，为此，明设置了“九边”重镇，并加修长城加以防范，其中的两边即山西的大同边和太原边。

明末满族入关，进而统一全国，开创了多民族共同共同发展的新篇章。

山西作为不同民族间文化和经济交往的舞台之一，始终贯穿整个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尽管不同民族之间战事不断，但和平与发展始终是民族关系的主流。

二、山西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概况

（一）先秦时期

山西，地处我国南北要冲，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原和北方两地的一条天然通道，山西北部一直是各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和民族文化的熔炉。

北方民族的逐步南迁自夏代就开始了。商代时有的已达到今山西北部，西周时进而深入到山西南部地区。商周时期，活动在这里的民族主要有华夏族、鬼方、土方、戎狄等民族，这些民族之间既相互攻伐又相互融合。

华夏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据先秦文献及考古资料考证，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生活在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被认为是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

从传说中的黄帝、尧、舜、禹时期，汉族先民经历了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并进入部落联盟阶段。公

元前 21 世纪，中原地区原始公社时代结束，中原黄河中下游大地相继出现夏、商、西周几个王朝，尊黄帝为共同先祖。且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华、夏、华夏的族名，此时华（夏）族的雏形已基本形成。

鬼方也称猃狁，是商周时期活动在北方与西北地区一个古老民族。有关鬼方的记载最早见于甲骨文、金文。“鬼”字有“隗”、“𩇑”等多种异体形式。鬼方主要分布在今山西、河北南部，其势力西及陇山和渭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要经营方式。其上至商周，下迄春秋都与中原地区有过战争，在商周时期影响最大。据载，商武丁时期曾与鬼方有过三年战争，且交往不断。

土方是唐虞夏商时期活动在北方地区的古老民族之一。在《诗经》《楚辞》中都有土方与大禹之间来往的记载。商代，商族与土方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殷墟甲骨中就有殷商与土方之间相互易物与战争的大量记载。据甲骨记载，郭沫若考释土方在今山西北部或包头附近；陈梦家则认为，土方即唐杜之杜，在今山西安邑一带；邹衡则考证说，晚商的土方在今山西石楼县。但无论如何，作为古代北方民族，因其迁徙频繁，故一族多地的情况是可能的。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晋国立国时，周边四邻为戎狄民族所环，如东南部太行山麓的赤狄、北部的犬戎、山戎、代戎及南部的伊洛之戎等。

赤狄是春秋时期北方地区少数民族，与长狄、白狄同为狄族的三个不同支派，主要分布在今山西长治地区，是

春秋时期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狄族部落。狄亦称翟，因其分布地区主要在成周雒邑以北，故又称北狄、北翟。

赤狄由6个氏族组成，即潞氏、皋落氏、留吁氏、甲氏、铎辰氏、廆咎如氏。公元前7世纪后期，赤狄因受晋国压迫，东下太行“伐邢”、“灭卫”。为抵御狄人，齐桓公率领郑、宋等华夏国开展了一系列助邢、保卫的军事行动。公元前594年，晋国在灭掉赤狄潞氏后，又相继灭其余诸部，赤狄从此不再以一个独立的族支形式存在。战国时期，狄族完全与华夏族相融合。

犬戎，商周时称为熏育，宗周之季称为玁狁，春秋时又称犬戎。《穆天子传》载，犬戎分布在今山西北部 and 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犬戎不仅与周族具有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的联系，同时也与周代的兴亡关系密切。周武王伐纣时，犬戎随之内迁，开始进入内地，并与中原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周宣王时，为了恢复文王时的境土，对四周的戎狄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周幽王统治时期，犬戎的势力已经向西南方向发展了。因幽王荒淫无道，内政废弛，申侯遂联合犬戎攻周，并在骊山之下杀死周幽王，灭掉西周。其后，平王东迁也主要迫于西戎、犬戎的威胁。

北戎与山戎同称戎，为戎族的不同分支，是春秋时期对北方地区部分戎族的称谓。山戎从字面上讲，指居于山区的戎人，战国以后又被称为胡。北戎在春秋初期经常与诸夏发生战争与会盟关系。在北戎之中又有称为山戎的一支。山戎曾经伐燕。公元前664年，齐桓公发兵救赵伐山戎，至孤竹而还。

陆浑之戎是春秋时期西方古老民族之一，属西戎的一支。春秋诸戎之名多依其处之地而名。陆浑之戎因其原地处秦西陆浑，故而得名。后因受秦人所迫归于晋。陆浑之戎归晋后，晋将其迁于伊洛地区。如晋伊洛地区之阴戎、九州之戎皆属于陆浑之戎。这些戎支经过长期与诸夏交往，到春秋晚期，相继为诸夏所征服，并渐渐融于华夏族了。

伊洛之戎与骊戎同属于西戎。伊洛之戎居于河南伊水与洛水流域，平王东迁后，秦文公战败西戎，地至岐地。在秦与西戎诸支斗争的同时，深入诸夏腹地的戎人与诸夏关系更为密切了。他们与诸夏既斗争又盟会。周襄王三年（前649），伊洛之戎参与了周王室内部分争权的斗争。到春秋晚期，这些不同的戎支相继为诸夏征灭，大部分变为晋人、楚人，并逐步融于华夏了。

骊戎居于骊山（今陕西临潼县境），顾颉刚先生考证则在今山西南部。晋献公五年，晋出兵伐骊戎，得骊姬。

春秋时，戎狄大量内徙中原地区，与华夏交错杂居。狐氏之戎即为与晋国同处百年的一大戎族。大戎狐氏周初即住于晋国境地，到晋献公时就与晋国关系十分亲密。以后，狐氏即改为姬姓，从姓氏上与晋国姬姓合而为一。

春秋战国时期，晋与三晋国家（主要指赵国）与周边戎狄民族文化交流可以说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晋国的“华戎联姻”、“魏绛和戎”和赵国的“胡服骑射”等。

晋国华戎联姻是我国古代不同族属或国家之间进行通

婚往来的早期典范。晋戎之间的通婚主要在各族的统治集团之间进行，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种婚姻是一种藉新的联姻，目的是借联姻以增强自己的势力。这种联姻起作用的往往不是个人感情，而是以统治集团的利益为基础。正是这种政治联姻，在客观上加强了各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了戎族与诸夏的融合。

早在周初，晋国就与戎狄有了往来，到晋献公时，晋国与戎族之大戎狐氏家族关系更为密切。晋献公娶狐突之女狐姬为如意夫人，生公子重耳；娶小戎之女小戎子为夫人，生公子夷吾；娶骊戎之骊姬生奚齐。重耳出奔狄时，狄人赐予廐咎如二女，曰叔隗、季隗。后叔隗嫁与赵衰，生赵盾。春秋时的“包君鼎”、“包君盂”和“郑国媿鼎”都可印证诸侯娶隗氏狄女的说法。

与此同时，姬姓诸侯之女也有嫁与戎狄之人的。如晋景公之妹嫁与赤狄潞子婴儿为妻；赵襄子的姐姐嫁与北狄代王为妻等。

这种与政治为基础的华戎联姻，主观上满足了不同统治集团各自的利益，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晋与诸戎间的政治和文化交流，加快了戎狄与诸夏的民族融合。

马长寿先生说：“晋国的古代居民占大多数的并不是华夏，而是华夏以外的戎狄部落或部落集团”。至于山西全境，梁启超指出：“今山西一省，当晋霸末兴之前，殆全属狄族势力范围。”为此，晋国坚持奉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基本国策。即以华夏之“夏政”与戎狄之“戎索”兼施并举，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晋国同戎狄民族的

交往和文化交流，并在进入春秋时代，伴随着晋国社会变革的深入和疆域版图的扩大，从政治、军事到思想观念、风情婚俗各个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民族文化交流。其中，如晋悼公时与山戎无终部缔约结盟的“魏绛和戎”就是典型的例子。

晋国始封，在今汾河下游、黄河以东地区，其北为戎狄少数民族聚居地。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到晋献公晚年的时候，晋国已成为与秦、齐等并列的强大诸侯国。为争取中原之地，秦、晋之间战事不断。晋国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秦等强大诸侯国，考虑到自身所处特殊的地理环境，于是对居于北方的戎狄采取了和平通好的战略政策。

魏绛是战国时期晋国人，其祖魏武子事晋有功，封大夫。其本人事晋悼公，为司马。在如何对待晋国北地的戎狄等少数民族问题上，魏绛从时局着眼，主张“和戎”。他认为，和戎的利处极多，概括起来讲，就是不用兴师动武即可扩大疆土、发展生产，增强晋国的实力与影响，从而使得远近诸侯及北边戎狄能欣然归附晋国。魏绛在说服晋悼公后，受命亲赴各地开展和戎工作。所到之处皆以盟约之策使得诸戎朝晋，而晋国也因此达到了扩大疆土、增强国力的预期目的，成为当时汉地一强大的诸侯国。晋悼公看到和戎后确实给晋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对魏绛之功甚为感动，赐予其乐师、乐器，说：“魏绛之和戎之策，使得晋国八年之中，九合诸侯。”

魏绛的和戎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将戎狄部族与汉族等同视之，提出了团结少数民族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